

## 第七章 結 論

光緒十五年，朱一新（A.D.1846–1894）入主廣雅書院，其以課堂上之問答，而著為《無邪堂答問》一書。某日，有生問曰：

問：《左傳》近注最多，洪氏亮吉、李氏貽德、臧氏壽恭皆輯古者也，顧氏炎武、惠氏棟、馬氏宗槿、姚氏鼐、沈氏欽韓，皆補注者也。諸說紛紜，時難抉擇，請示其得失。<sup>1</sup>

清代自顧炎武《左傳杜解補正》以降，就已注意到杜注單行的問題，其言曰：「今杜氏單行，而賈、服之書不傳矣。」<sup>2</sup>因此，有輯古注以為《春秋左氏傳》之注，亦有「補正」杜注而為《春秋左氏傳》之注；二者所依循的方法不同，然其對象卻頗為一致，皆以杜預注作為相對的象徵。

然而，處於諸家攻伐之下的杜預注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其實更難賴此得到如實的理解，反而致使《春秋》經傳的意義，益顯隱晦。因此，朱一新答曰：

《左氏》後立學官，故漢儒遺說存於今者，劉、賈、服三家而外，並不多見。賈、服注與杜氏異者，大義不過數十條，餘皆無關宏旨。李次白輯而疏解之，是矣。賈、服與元凱互有得失，而二家注已不全，治《左氏》者，不得不以元凱為主。近儒多申賈、服而抑

<sup>1</sup> 見朱一新：《無邪堂答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.12.），頁98–99。

<sup>2</sup> 見顧炎武：《左傳杜解補正》（清經解本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6.9.），卷1，頁1。

杜，此一時風氣使然，非持平之論。<sup>3</sup>

此一時之風，所「壓抑」的只是在「經傳」之下的「杜注」，卻無法「壓抑」杜注之上的「經傳」形式。因此，朱一新曰：「治《左氏》者，不得不以元凱為主」；所言不僅在於杜預注上，更重要的在於「經傳集解」的意義。所以，當李貽德廣為搜羅所謂的「賈、服舊注」之時，其所注解的「經傳」，其實與杜預無異；也就是說，輯古者與補正者，其實都還在杜預的框架當中。

以杜預之前的經傳關係而言，《左傳》是如何被援引來解經的，今日已難知全貌；單就古書載錄下的隻字片語，而欲「申賈、服」所注，其實亦已非是六朝舊觀。因此，清人「一時之風」，也只是在「經傳集解」的體例之下，對於杜預「單行」的偏見。在舊注不可得，<sup>4</sup>而今注單行的情形之下，遂演變出多部拆解「經傳集解」的「仿古」？品。如前言所舉的段玉裁《春秋左氏古經》之作，又如上舉洪亮吉（A.D.1746–1809）《春秋左傳詁》、臧壽恭（A.D.1788–1846）《春秋左氏古義》之作，都是相類的情形。<sup>5</sup>

可追問的是，如果不具有「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」的「經傳」，上

<sup>3</sup> 見朱一新：《無邪堂答問》，頁 99。

<sup>4</sup> 今日可以考見《春秋左氏傳》最早的版本，為日本書道博物館藏西晉寫本（見書影 8）；饒宗頤考定為杜預注本，其實並非如其所言，此葉為一「非杜注」的版本。見饒宗頤：《法藏敦煌書苑精華》（廣東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3.11.），第 3？，頁 297。

<sup>5</sup> 除此之外，尚有劉師培《春秋古經箋》、《春秋古經舊注疏證》之作，然皆未為完秩。錢玄同附記曰：「所用之稿紙版心刻有『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』字樣，蓋申叔欲續其先世纂述而未完成之《左疏》，先從事於疏證經文也。」見劉師培：《春秋古經舊注疏證》（劉申叔遺書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7.11.），頁 3。由此可知，劉師培在處理「經傳」體例時，已經與劉文淇不同；劉文淇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一書，仍因襲杜預「經傳集解」的模式，而劉師培的《春秋古經舊注疏證》，已經將經傳分別疏證。

述著作將經與傳二分的意義為何？據本文所論，拆解「經傳集解」之作為，乃是著眼於「集解」的「體例」，卻不去深究何謂「經傳集解」的意義；因此，在拆解完後，其實只是一部比較「省覽為煩」的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。所以洪亮吉、臧壽恭等人，都必須重新理解「經傳」，如洪亮吉《春秋左傳詁序》曰：「於是冥心搜錄，以他經證此經，以別傳校此傳，寒暑不輟」；<sup>6</sup>所造成的結果，其實如朱一新對於臧壽恭的批評曰：「多引《公》、《穀》以汨《左氏》，不知三傳各有指歸，無庸強合」，<sup>7</sup>同樣的情形，也就發生在洪亮吉的方法上。

此皆顯示出一個困境，也就是《春秋左氏傳》等同於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導致後世透過春秋左氏學的研究，不得不面對杜預所樹立下的典範。因此，有些人所採取的方法，便不是繞過眼前矗立的巨山，而是針對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的不足與缺失，進行「補正」的工作；這樣的方式，便不會在「經傳集解」的形式上，與杜預發生抗衡。

由此而言，本文針對杜預「經傳集解」的形成進行討論，則與上述清儒的兩種困境恰好相反。在本文的行文脈絡中，並不刻意預設杜預「經傳集解」優劣與否的立場，也就不會發生與杜預對立的局面。根據《晉書·杜預傳》載曰：

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，世人未之重，唯祕書監摯虞賞之，曰：「左丘明本為《春秋》作傳，而《左傳》遂自孤行。《釋例》本為傳設，而所發明何但《左傳》，故亦孤行。」<sup>8</sup>

<sup>6</sup> 見洪亮吉：《春秋左傳詁》（續修四庫全書影授經堂刻本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.），序，頁1。

<sup>7</sup> 見朱一新：《無邪堂答問》，頁99。

<sup>8</sup> 見《晉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95.6.），卷2，頁1032。

當杜預「經傳集解」不為人所理解的時候，其一當為初出之時，故只有摯虞一人賞之；其二則為盛行之時，一時風氣，難以持平。因此，何謂杜預「耽思經籍」，而後「備成一家之學」之意？何謂「經傳集解」的形成？本文依循著杜預原有的脈絡，而試圖有所心得；於是，選擇了不同於洪亮吉等人的途徑，而議論「春秋左氏學」的完成。

洪亮吉曰：

此書盛行千六百年，雖有樂遜《序義》、劉炫《規過》之書，不能敵也。況今日去劉炫等，又復千載，其敢明目張膽起而與之爭乎！

9

洪稚存的筆下有其憤恨之意，這在諸多清儒身上皆可發現類似的筆調。然而，這只是一種空洞的行文，背後的立場，恐怕比任何一位六朝儒者還稀薄；於是他想到了樂遜，也想到了劉炫，只怕無法援引其音容，而在解釋《春秋》「經傳」之上，失其「明目張膽」。

因此，本文不在此徘徊，本文在面對一千八百年前的杜預時，希冀一切的可能，知其音容，得其「耽思」之意；以為「經傳集解」之形成，並以為能夠理解杜預《左傳》之「癖」。<sup>10</sup>

---

<sup>9</sup> 見洪亮吉：《春秋左傳詁》，序，頁 1。

<sup>10</sup> 晉武帝問杜預曰：「卿有何癖？」杜預對曰：「臣有《左傳》癖。」見《晉書》，? 2，頁 1032。